

外交口译员的角色再定位

——以 2021 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为例

李清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 广汉 618307)

【摘要】 本文以 2021 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为例, 针对双方口译员的角色表现与外交口译员中立性、隐身性的典型角色开展对比研究, 旨在考察对外会晤语境下外交口译员角色定位。研究发现双方译员的角色表现均不符合中立性和隐身性,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就服务对象而言, 译员以本国国家利益至上; 就形象礼仪而言, 译员具有一定的显身性, 且美方译员的显身性程度更高; 就译语分析而言, 译员通过情态动词的偏移调整来维护国家形象、维持会谈和谐氛围, 并在私下对话中积极采取话轮处理策略来推动会谈顺利进行。

【关键词】 外交口译; 中立性; 隐身性

一、引言

外交口译主要服务于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等高层的交际或谈判, 口译内容涉及国家政策, 最终代表国家利益和国家外交立场, 而非个人情感或想法,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国际冲突, 具有高度敏感性; 此外, 较高的主题互通性和受众知识水平也极大限制了外交口译的灵活度。^[1] 因此, 传统理论认为译员角色是“传声筒”、“隐形的翻译机器”或“讲者的喉舌”, 代表着业界对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立场绝对中立、不受任何主观因素影响和制约的角色期待。近年来, 该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 例如任文和蒋莉华通过话语分析提出译者具有一定的参与性和主观能动性, 能对交际活动的方向和结果产生影响^[2], 但是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服务对象上, 囿于法庭口译和商务口译; 口译场合上, 主要探讨社区口译; 即使有涉及外交会议口译中口译员的角色研究, 也多以总理答记者问等国内外外交场合为研究案例, 缺乏对外会晤语境下的外交口译员角色研究。因此, 本文以 2021 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双方口译员的现场表现为案例探索外交口译员角色表现, 以期弥补该研究缺口。此次战略对话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且首场会谈具有公开的现场视频, 包括中美两国代表的开场致辞, 便于保证语料的完整性和可信度, 有利于考察外交场合中口译员的角色表现是否符合其典型角色。

二、外交口译员的典型角色和角色表现

社会语言学家戈夫曼将“角色”这一概念分解

为典型角色 (typical role) 和角色表现 (role performance), 在该视域下, 任文进一步将译员的典型角色定义为“译员管理机构以及口译服务终端用户对译员的角色期待”, 将译员的角色表现总结为“译员通过语言、副语言和非语言方式”呈现的实际表现。^[3] 结合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AIIC) 等译员管理机构提出的译员职业规范, 本文将展开论述此次中美高层会谈中译员的角色表现是否符合中立性和隐身性的典型角色要求。

当译员与现场任何一方都无从属关系或者译员平等地忠实于与会双方时, 译员具有中立性 (neutrality)^[4], 但外交场合中的译员通常为一方政府聘用, 很难实现中立性。如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 中方口译员张京为中国外交部翻译司高级翻译, 美方口译员 Lam Chung-Pollpeter 是美国国务院聘请的口译员, 两位口译员的立场服务于雇佣方的立场, 尤其在涉及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时, 必然会背离中立性原则, 发挥主观性调整口译内容甚至纠正发言人的口误来避免引发误解。

隐身性 (invisibility) 和显身性 (visibility) 也是讨论译员角色的争议话题。在外交口译中, 译员的隐身性一方面体现在形象礼仪上, 如遵守会场着装规范, 在官方摄影和媒体报道中避免出境等^[5]; 另一方面体现在口译 “准确、完整、忠实地再产出源语信息”, 发挥职业要求的信息传声筒作用^[6]。詹成曾指出多数外交口译员都认为自己几乎不可能保持隐身性,

相反,只有发挥协调作用,才能帮助会谈的顺利进行。

[7] 在本案例中,两位译员都出现在了官方会谈视频当中,且座位处于双方主要代表旁边,靠近会场中央位置;服装上,中方口译员与中方发言人搭配一致,以黑白为主,而美方口译员身着灰色格纹西装、发色呈灰紫色,在美方黑色西装为主的代表团中较为抢眼。由此可见,在形象礼仪上,双方译员都具有一定的显身性,且美方译员的显身性程度更高。

三、案例话语分析

除了从服务对象和形象礼仪两个方面考察译员角色以外,具体的话语分析同样不可或缺。在这一方面,中立性要求译员完全忠实于原文,不得有所删改或调整,尤其在情感指向上保持一致,不得偏移;隐身性则要求译员退居发言人身后,只发挥“传声筒”的作用,不能主动参与话语构建。[8] 但本文对比分析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原文和译文发现:口译内容出现了不同于源语的调整,且期间译员与双方发言人进行了私下讲话(small talk),与中立性和隐身性的要求有所背离。以下将具体从译语情态动词的偏移以及译员在私下讲话中采用的话轮处理策略入手,来论证译员的角色表现如何背离了中立性和隐身性的典型角色要求,以及对话语交际活动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 情态动词偏移分析

功能语法认为情态是构建人际意义的重要实现手段,口译中区别于源语情态动词的变化能突显译员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 and 处理,由此可管窥口译员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基于Halliday的情态分析框架,李鑫提出汉英情态量值梯度表,以下将根据该梯度表(表1)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中情态动词的偏移倾向及其反映的人际意义。

情态量值	极低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极高
英语表达示例	could	may can be able to	would	will be going to should want to I think I hope	need to	must always I believe	无情态标记
汉语表达示例		愿意	可以 可能 能够	要 将 应该 会 我想 我希望	需要	必须 一定 我相信	无情态标记

表1 汉英情态量值梯度表^[9]

(1) 中方原文: 人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游戏,应该改变自己的思想模式,在21世纪让所有的国家,大小国家,特别是大国,能够团结一心,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我们的贡献,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方译文: So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abandon the cold-war mentality, and the zero-sum game approach, we must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nd make sure that in this century, the 21st century, countries, big or small, particularly the big countries should come united toget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of humanity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在例(1)中,译员将中值的情态动词“应该”分别翻译为中高值的英语情态动词“need to”和高值的“must”,还将低值的概率情态动词“能够”译为中值的义务情态动词“should”。三处变化都通过“强化”偏移来凸显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挑战的坚定决心,加强了中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团结一心的有力号召,突出了中国秉承和平友好原则的正面国际形象。

(2) 中方原文: 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如果美方愿意的话,我们愿意共同把这份责任承担起来把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做好。

中方译文: So we will be watching what will happen today and tomorrow. 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I think our two sides should step up to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deliver on this task that we are given.

例(2)出现于王毅致辞的尾声,此前中国代表团为捍卫祖国利益和中国形象,使用了较具攻击性的语调,言辞中不乏对美方的批评。译员增译“I think”这一中值主观情态表达以突出讲者个人主观性,减弱了后面内容的确定性和命令性,这一“主观化”偏移有利于缓和现场会谈氛围。

(3) 美方原文: I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美方译文: 我也强调过,我们双边的关系,在可能有竞争的情况下……

在例(3)中,美方译员将原文中值的情态动词

“should”翻译为低值的概率情态动词“可能”，通过“弱化”偏移降低了源语的尖锐程度，减弱了中美竞争话题可能引发的现场交锋和冲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友好的交际氛围。

以上几处翻译调整主要体现了情态动词的“强化”、“主观化”和“弱化”偏移及其产生的影响：“强化”偏移加强了发言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而“主观化”和“弱化”的偏移减弱了攻击性和尖锐程度，使会谈氛围更和谐。情态动词的偏移反映了译员有意识地在外交场合中发挥主观协调作用，而非一味保持中立性和隐身性。

（二）发言人与口译员的互动话语分析

口译的本质是不同语言系统的发言人通过口译员进行语言交际的过程，发言人偶尔会与译员展开私下对话（small talk），其中的话轮转换过程能体现译员的角色表现。以下将借助话语分析理论来解释译员在发言人与其互动对话的过程中主动采取话轮策略来发挥协调作用，以论证译员角色表现与典型角色的背离。

中方代表杨洁篪在超过16分钟的发言结束后，示意另一位中方代表王毅讲话，显然在传递话轮时忽略了口译流程，王毅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手指译员的位置，用身势语提醒这是口译的话轮，张京马上说“我先翻译一下吧”来打断杨洁篪对话轮的传递，并指定下一轮话轮。之后，杨洁篪将头转向张京问道：“你要翻吗？翻吧。”主动将话轮传递给译员，并接着用英文说“It’s a test for the interpreter”，布林肯接道“We’re going to give the translator a raise”。张京笑了笑，然后立刻开始了对杨洁篪发言内容的翻译。这一对话互动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中方口译员在被发言人忽略之后主动打断话轮。规则性话轮（即讲者A——A方口译员——讲者B——B方口译员）被杨洁篪忽视后，张京主动打断并指定自己进行下一轮话轮，将话轮带回既定顺序，体现了译员作为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主动发挥对话语活动的协调作用。二是译员对于杨洁篪和布林肯的英文玩笑采取了忽略话轮的策略。此时是中方的发言轮次，布林肯的玩笑仅仅是对杨洁篪的回应，双方都不希望在此处大做文章打断整场对话的节奏。因此，美方口译员选择忽视该话轮证明她认为这在当时并不是十分重要，不需要立刻翻译出来，体现了译员在互动对话中独立的判断力和能动性，并不是完全依附于发言

人的“喉舌”，而是话语交际活动中积极的参与者和共建者。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2021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口译员角色表现分析发现，即使是在灵活度非常受限的外交场合，中美双方译员仍然没有盲从典型角色的中立性和隐身性要求，而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来协调现场交际活动。从服务对象的角度，译员必须忠实于本国利益，在口译过程中捍卫本国形象，这不符合中立性要求；从形象礼仪的角度，双方口译员不符合隐身性原则，尤其是美方口译员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显身性；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译员在翻译情态动词时进行了偏移调整来维护国家形象、维持外交场合友好氛围，并在私下对话中采取打断和忽略话轮的策略来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推动会谈顺利进行下去。上述发现对外交口译实操与外交口译研究提供了思路上的借鉴与参考，但仍然需要更多的案例分析和更多元的角度补充研究，以期为外交口译员角色研究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任小平. 外交口译的灵活度[J]. 中国翻译, 2000, (05): 40-44.
- [2] 任文, 蒋莉华.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识口译人员的角色[J]. 中国翻译, 2006, 27(02): 61-65.
- [3] 任文. 戈夫曼社会语言学视阈下口译员话语角色的解构与重构[J]. 中国翻译, 2017, 38(04): 18-25+128.
- [4] Young, O.R. The intermediaries: 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5] Gheorghiu, C.I. A taxonomic analysis proposal for research in diplomatic interpreting[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20, (21): 23-41.
- [6] 邓建华, 黄永芳. 政治外交场域中口译员的角色研究[J]. 理论界, 2015, (09): 118-125.
- [7] Zhan Cheng. Mediation through personal pronoun shift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of political meetings[J]. Interpreting, 2012, (14): 192-216.
- [8] 付琳纳, 孙晨, 毛延生. 政治口译中译员的“隐身”与“显身”——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口译员对比研究为例[J]. 外文研究, 2022, 10(02): 63-71+108.
- [9] 李鑫. 政府记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偏移的描述性研究[J]. 外语教学, 2018, 39(04): 86-91.